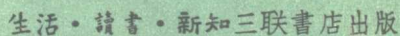


尚 鉞 著



中國資本主義关系
發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

尚 鉞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1956年·北京

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發生及
演變的初步研究

尙 鉞 著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證出字第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850×1168公厘 1/16 印張9 1/4 插頁2 字數202,000

1956年4月第1版

195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7)1.00元

統一書號11002·58

作者的話

我們學習歷史唯物主義，深切地体会到斯大林所說的“社會存在怎樣，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怎樣，社會思想、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也就怎樣”的正確。

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最簡明、最具體的指示。但是，把這個簡明而具體的指示，實際運用到歷史問題上，卻並不是簡單的問題。因此，就造成我們在歷史事變、問題和現象的研究上，常犯或大或小的錯誤。這原因，毛澤東同志分析其根源說：“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家對於社會的歷史只能限於片面的了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一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毛澤東選集卷一頁二八二）

我們，今天的歷史科學工作者，恐怕很少不在毛澤東同志這種科學的分析和概括之中。因此，我們認為，如果對於中國歷史上任何重大問題和現象，能作出完全正確無誤的科學結論，就我們今日在思想改造過程中所能達到的理論和業務水平說，都還是很不夠的。

再就歷史科學這個對思想理論各部門學術具有綜合性的科學來說，也如一切上層建築一樣，不只是消極地反映基礎，而且是積極地為基礎服務的。因此，在解放以前長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

1955/11

地主階級的經濟，另一方面是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農民經濟和手工業經濟等等。這就使中國社會經濟內部具有強烈的矛盾性。自“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中國社會內部這種對抗性質的矛盾，反映在觀念形態上，就表現出強烈而尖銳的鬥爭。而且這種鬥爭，是隨着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爭取中國民族解放的革命運動之日趨高漲，而日趨尖銳。這種矛盾和鬥爭，不僅反映在政治制度、政治觀點上，而且也反映在哲學、文學藝術和歷史科學上。多年來，中國歷史上的許多重大問題的論爭，據我個人的淺見，無一不與這個鬥爭有密切的聯繫。而歷史科學是黨性的科學。因之，這些論爭就不能不含有不同的階級的本質。

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是自覺地站在這一立場或那一立場而提出和堅持這種或那種主張的。事實上，在今日說，除了極少數頑固分子以外，絕大多數的歷史學家沒有不是願意站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立場上的。這種情形是非常有利於歷史科學的建立和發展的。因此，就使我們有問題敢於大膽提出，並一定能獲得專家們和廣大的讀者同志們的熱情幫助。

這裏，關於中國社會歷史上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過去長期的論爭，就是屬於這些問題之一。

關於這一問題，過去，有的所謂史學家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是在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由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用洋槍大砲打進中國來的，不然，中國是不會發生資本主義的。也有史學家認為中國歷史上沒有資本主義萌芽，如果說有的話，只有在明末由西洋傳教士輸入，為中國士大夫分子所接受而引起的。這些說法，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我們知道，外因不通過內因是不能起作用的，暴力的作用也只有在具備一定物質條件的地方才有可能。這是恩格斯早就在反杜林論中作了明確的指示的。

又有些所謂“思想家”和“歷史家”硬說：如果中國沒有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永遠也不會有資本主義產生。因之，他們就得出結論，感謝帝國主義的侵略。顯然，這樣的“思想家”和“歷史家”，只是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製造歷史和理論根據，如胡適和梁漱溟之流就是如此。

另外，還有蔣匪幫豢養的文化流氓所假扮的所謂社會史學家陶希聖之流。他們配合着蔣匪幫對共產黨和革命的殘暴壓迫，展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和進攻。首先，陶希聖為着反對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針對着“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和馬克思主義所闡明的人類社會發展已存在有五個生產階段，他把中國社會歷史也狂妄地分成五個時期：一是“氏族社會末期及原始封建社會”，二是“奴隸社會”，三是“發達的封建社會”，四是“城市手工業及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五是“清末以來半殖民地社會”。並妄圖歪曲我們黨提出的當時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而說中國是“以半殖民地的地位向資本主義轉變”（陶希聖北京大學講義中國社會史研究第三次改訂本）。不說陶希聖這種混亂的歷史分期毫無事實與理論根據，而且其邏輯系統也十分荒謬，不僅封建社會內部的階段的劃分，會有“原始的”和“發達的”，而且兩段之間還夾雜着一個“奴隸社會”。這與我們根據土地所有制的原則和人身隸屬關係來區分封建社會內部階段的理論是絕對相反的。此外，還有陶希聖的嘍囉們，如李中立在其所著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辯的前言中，既否定由封建社會的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又否定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商業資本不能創立新的生產方式，硬說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中間還有一個過渡階段，即商業資本主義社會階段。他說：“任何一個社會形態進展到另外一個社會形

态，其間都是因有商業資本的分解作用存在，否則社会形态便沒有進展的可能”(食貨半月刊三卷五期商業資本主義社会辯)。照这种“非驢非馬”的商業資本社会發展的作用論，我們只指出原始社会中由母权制社会向家長制社会过渡或社会主义社会向共產主义社会过渡，絲毫与商業資本無關，而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所引起的生產關係的变化，即生產方式决定的，就可知道他的話已達到如何荒謬絕倫的地步了。此外还有，王志瑞在其所著宋元經濟史的緒論中說，“商業資本底力量足以支配社会經濟，就成了商業資本社会”，或“商業資本主義社会”，並加以荒誕的解釋說，“決定从手工業都市社会推移到商業資本主義社会，第一是生產底一般增加，第二是从事商品運輸的生產部門底迅速發展”(宋元經濟史頁一——一二)，並从而肯定宋元为商業資本主義社会。这种“手工業都市社会”和“商品運輸的生產”究何所指，實不得而知，因之其所構成的社会階段，也就必然不是歷史的現實，而僅是主觀的“非驢非馬”的杜撰，这是很明顯的。

總觀这些文化流氓們的謬論，其目的就在於攪亂馬克思主義所闡明的社会發展規律，和混淆我們政治經濟學上特定的社会階段的術語，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等等，主要的是企圖隱避地主和資本家所有制之下的剝削關係，顯然是掩蔽當時工人和農民的劇烈階級鬥爭的事實。特別是对資本主義術語的歪曲，其政治目的就更明顯：一方面，妄圖証明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从古以來就存在，是永恒的真理；另一方面，他們拚命否定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所指明的特定歷史範疇，目的就在於否定資本主義本身所具有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矛盾和鬥爭。因為經過这个階級鬥爭，資本主義制度便必然為無產階級的社会主義革命所推翻，並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而為社会主义社

会所代替。

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確定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而陶希聖及其嘍囉們，當時配合蔣匪幫向我們的軍事與政治進攻，拚命叫喊什麼“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從上述簡單的摘引中，可以完全揭露出他們的徹頭徹尾地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兩大支柱——大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服務的反動面目。

我們對於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是與上述一系列的理論觀點，特別是與陶希聖之流的理論觀點，完全相反的。我們不僅在古代史上，不拘在任何文獻上資料上未看見什麼商周是原始封建社會，也未看見商業資本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能創立什麼新生產方式。同時，我們根據歷史事實，認為在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明清時代，中國社會內部，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已在孕育着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因此，中國社會即使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也會緩慢地走上資本主義社會。不僅如此，根據已接觸到的史料來說，一八四〇年以前，中國社會經濟中資本主義的萌芽雖然還沒有佔統治地位，但它的比重是相當大的，問題只在於它與巨大機器工業相較的特點就是技術不發展，工資低到可驚的程度（參看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頁一〇〇）。因此，如說僅僅是一點極微弱的幼芽之類，就與當時大規模社會分工，數以百十計的大工商業城市乃至專業城市的存在，農業上商品性生產的相當普遍，商品經濟相當高度的發展，以及現代意義的民族思想的蓬勃發展，市民鬥爭與日俱烈的高漲的形勢，乃至文藝和哲學思想的反封建特權，要求個性解放的思潮等等，是不相稱的。因此，這就不是我們在書本上能找到幾條手工業工場記錄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在起着帶有本質性的變化的

問題。

這裏，應特別提出的，即我們所說的商品經濟，雖在本集中已有所論列，但這裏還要指出它是與自然經濟對立的一種經濟現象。它的發展是封建社會末期，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出現了兩種商品所有者，一方面是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所有者，另一方面是自由勞動力的所有者，在市場上相遇，而且資本家能夠購買勞動力並在生產過程中剝削它。這兩者由相互對立而發生接觸的關係，就是資本主義的關係。所以，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事實上，是在這個地方開始，在這個地方，同一個資本同時僱用較多數的勞動者，以至勞動過程擴大了它的範圍，而以較大的量的規模來供給生產物。較多數勞動者在同時、在同地（或在同工作場所）、在同一資本家的命令下，生產同種商品，在歷史上，和在概念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人民出版社版資本論卷一頁三八四）。至於這個資本的多少，製造場所的規模大小和是否採用機器，僱用勞動者的由數人到數十百人的數字大小等等，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程度和階段的差異，其為資本主義生產則是一樣的。列寧曾批判過那些所謂“人民之友”說，“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瞭解毫未超過平常庸俗觀念，以為資本家就是經營着巨大機器生產的一些富厚和有素養的企業家，却不願知道這一概念底科學內容”（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頁一〇〇），是值得我們慎重考慮的。

不過，要弄清楚的是：這種情形決不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早期和中期自然經濟統治時期所能有的。譬如，漢代張安世有家僮七百人，組成了一個規模相當大的手工業工場，也在進行商品生產，但卻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因為勞動者雖多，却是奴隸。唐代定州富豪何明遠家有綾機五百張，勞動者可能更多些，但還

不能說那是資本主義生產，因為就唐代整個社會經濟結構——自然經濟佔統治——說，這五百張綾機的勞動者，與何明遠的關係，還無擺脫封建關係束縛而成為自由勞動力所有者的事實記錄。所以，上兩者都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記錄。資本主義生產，只有在封建社會末期，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商品經濟中，才可能出現。而商品生產，我們知道，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才能達到它的最高形式。

因此，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僅是闡明中國社會發展規律所必需的，而且在過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對於批判帝國主義侵略的荒誕思想和謬論，與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有着巨大的積極作用。

關於明清時代封建社會中孕育着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舊的資產階級學者給我們留下來的東西，幾乎是一片空白。他們大多數也如梁漱溟一樣，硬說清承明制，因而中國社會就是清代和明代一樣；而明代又與宋元時代差不多。這樣推上去，一直到兩漢時代，中國社會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甚至有的效法外國法西斯文人的口吻，說中國社會歷史上也有過發展時代，不過這個發展是由外國侵入帶來的，譬如元朝時代和鴉片戰爭以後。顯然，這是與中國歷史事實完全相反的，因為恰恰在這些時期，中國社會發展受到了阻礙，而且在這些時期以外，發展的綫索就很明顯。這種發展的綫索，不拘從經濟狀況，從政治制度和政治觀點，從法律，從文學藝術，從哲學思想，以及從社會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內容與形式上看，只要細心地比較一下，都可以看出它的痕跡來。這種發展的痕跡，不僅從兩個或多個相繼的大的朝代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在一個大的朝代內部，如西漢與東漢，中唐以前和中唐以後，北南兩宋，明代成化以前和以後，清代的

乾嘉以前和以後，都可以看出明顯的發展與變化。當然，這種發展與變化是習慣於觀看統治階級的歷史，而無視勞動者階級的歷史——農民、手工業者和奴隸們生產及生活狀況的發展史，以及他們對於統治的剝削階級鬥爭形式發展的歷史——的先生們所不能看到的。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批判的，“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歷史”的具体明証。事實上，像中國這樣地大、物博、人多的國家，而人民又是富於辛勤勞動和革命首創精神的人民，這樣優越的人力在這樣優越的自然條件之下，他們所組成的社會能够在二千年的長時期內不向前發展，不發生變化，這也是不可想像的。這不僅不符合於歷史事實，而且也是不符合於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的。

這個問題雖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義，但過去的歷史家和學者們却未給我們留下什麼，甚至極其貧乏的什麼也沒有。因此，這個歷史任務就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身上了，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不相信中國社會像舊資產階級史學家和學者所說的那樣奇怪而荒誕的：長期停留不動，以等待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所以，從抗戰以來，如呂振羽同志、侯外廬同志、胡繩同志和蘇聯的若干史學家都提出了明末清初中國社會中已經孕育着資本主義的萌芽。雖然他們所能提供的材料不多，甚至個別材料還有不十分妥當的地方，但這個方向是正確的，是符合於中國歷史實際的。

作者根據前人的研究和啓示，參考近數年來國內外學者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和闡發，加上我們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同志們對於這一問題的史料和理論各方面的搜羅和探討，初步寫出關於明清兩代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與發展的兩篇文章和一篇明清之際思想問題研究的初稿。在這裏，我應該

說明的：这三篇文章，只不过是我在許多同志已有的努力和成績的基礎上，試探着对 这一問題——中國資本主义發生和發展的問題——作較多方面的探索，並提出我所能接觸到的材料和現象，以供國內學者作進一步研究的起碼墊腳石。特別應該感謝的是：侯外廬同志，他在思想史方面給了我不少的幫助；其次，傅衣凌先生，当我去年準備在作家协会作紅樓夢時代背景的報告，亦即初步整理材料寫這幾篇文章時，他提供給我若干有益的材料；還有，我們教研室的許多同志，在資料和理論多方面給我的幫助。這些幫助，使這幾篇文章不僅增多些內容，而且少犯些錯誤。

其次，这个集子，按原來計劃，是与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版、我所收集和主編的明清之際中國社会性質之探討一集成一个集子，对这一時期中國社会發展及变化總的趨勢，做比較全面的攷察的。在那个集子中收的是我們教研室一九五五年教師研究班畢業的韓大成、王方中、黃佩瑾和李之勤四位同志的科學論文。韓大成同志从明代資本主义關係的萌芽及其增長方面、王方中同志从明代賦役制度变化方面、黃佩瑾同志从明代城市經濟發展方面、李之勤同志从清代前期商業性農業經濟發展方面，比較詳細地論述了这一時期中國社会的發展和变化。但因这四篇文章完稿的時期較遲，又感覺着合起來分量重，所以決定分成兩個集子。这个集子收了我所寫的这三篇，那个集子則收了那四篇。实际上這兩個集子，仍然有密切的聯繫，成为姊妹集子。因為它們所共同努力的方向，初步提出關於中國資本主义萌芽問題，是一致的。

但這是一個大問題，為着能獲得比較全面的認識，所以本集所涉及的範圍比較廣泛，不單限於經濟。這幾篇文章不拘在材

料方面或理論方面都還貧乏，有些材料的運用和理論的解釋，由於我涉獵的範圍很窄狹，研究的不深入，錯誤定所難免。因此，當把這三篇文章編成一本小冊子付梓時，就特別感到不足。就是我們教研室的同志們所涉及的方面，我還未能抽出時間，盡量吸收並採納他們的意見。由於力量和時間的限制，只能做到多少算多少，正確與否尚待討論和指教。不過，為着能得到更多方面的同志們的幫助和專家們的指教，使自己有所提高和使這個問題能得到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討論，我相信這樣做和出版這個小冊子，作為“拋磚引玉”來說，是有其必要的。

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

目 次

作者的話

中國資本主义生產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長..... 1

清代前期中國社会的停滯、变化和發展.....73

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的發展及其演变..... 145

附錄..... 273

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長

一 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

中國社會在公元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前，是否有資本主義生產因素存在的問題，過去還沒有很多的同志從事研究。最早的如呂振羽同志在其所著簡明中國通史中就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自由商人（市民）的活動，國內外市場的擴大，肯定了明代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其次侯外廬同志在其所著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上，就清初學術思想的反映，曾提出在封建社會的內部，已經有了新的東西，出現了“城市異端”，肯定了明清之際中國社會已有資本主義生產因素萌芽的存在。

我們在講授中國人民大學的中國歷史課程中，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和過去學者的研究，自一九五〇年即提出遠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前，中國已有資本主義最初的萌芽。那麼，什麼是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萌芽呢？

據我們的看法，所謂資本主義，即在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的人們相互間一定的關係，並且不管人們在比較的各个範疇的發展程度大小如何，當這種關係開始存在時，我們就可以看見兩種極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一方面是貨幣、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所有者，他並渴望着購買到別人的勞動力，來增殖他所佔有的價值量；另一方面是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自由”的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兩者由相互對立而發生接觸的關係就是資本的關係，也就是在一個地方，或在同一的工作場所，在同一

資本家的命令之下，被僱傭的較多數的勞動者，生產着同種商品的關係。馬克思稱這種關係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自然，在這種關係之下，我們所說直接勞動者的“自由”，指的是就他已脫離了生產資料[⊖]，再不受封建土地佔有關係及行會、師徒等封建關係的束縛的意思。

如果這種關係，可以稱作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中國最初有這種關係萌芽的現象，並不晚於西歐。在西歐，這種資本主義最初的萌芽在十四十五世紀，已經在地中海沿岸若干城市，可以稀疏地看到。如意大利的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等城市，在十四世紀中葉所出現的手工業作坊。如佛羅倫斯城擁有一二十個工資勞動者的呢絨作坊有二百家以上。它們由簡單協作，每年能生產成萬匹的呢絨。

這種類似的現象，中國早在南宋末和元初，就已隱約看到。就生產工具說，在這一時期，中國江西地區出現了水轉連磨。這種工具，當時是專門用之於對外貿易的製茶手工業的。據元初王楙估計，把這種製茶的磨改作製米的確碾，“日得穀食，可給千家”（王楙農書）。在北中國同時也出現了水轉大紡車，可以“日夜紡績百斤”。而當時中國繁盛的大商業城市，據馬可孛羅遊記記載，南京城“大半經營商業”，“出產生絲，織成大量的金銀綫布，並有各種各樣的花樣”；鎮江府的居民也是以工商業維持生活，重要手工業是“紬緞和金綫布”；常州較鎮江為大，“產生絲甚多，並用以織成各種分量和花樣的紬緞”；蘇州的絲織業就更繁榮，“周圍有二十哩，居民有巨量的生絲，不僅以之製成綢緞，供自己的消費，……並且還運銷其他市場。他們中間有一些富商大賈，

⊖ 在東方，在較晚時期俄羅斯也同樣，而且這種勞動者，有時還保有一點耕作經濟。

而居民數目之多真是驚人，然他們……只以工商為務。在工商業上的確表現很大的能力。”這裏，他雖說明了這些絲織業製造是商品生產，但還不明確這些手工業中的勞動者的性質。在當時的杭州，他却給了我們比較明確的概念。杭州是當時中國最繁庶的大商業都會，他描寫當時杭州的情形，除各街道無數商店外，還有十二種發展較高的手工業，每種手工業都有較多的手工業作坊。這些作坊中，擁有勞動者十人、十五人、二十人，乃至有少數大作坊，竟擁有四十個工資勞動者，“各受主人支配”。他敘述這些作坊中的生產關係說：“這些工場中富裕的手工業主人並不親自勞動，且表現縉紳的風度，裝腔作勢地搭起架子來。他們的妻子也同樣不作工。……只要他們有了財富，可以僱用工人經營父親的職業，自己不必親自勞動。他們的住宅建築華麗，並且雕梁畫棟地裝飾起來。……花在……建築上的錢數確有可觀。”

不過，這種生產關係是否就是資本主義的關係還很難說。因為從工人“各受主人支配”的話來看，究竟手工業主人對於勞動者“支配”到如何程度，是否是人身依附的關係？抑或是“資本家的命令”？都有可能。同時，這些勞動者，是否仍受行會的束縛，都不夠明確。另一方面，由東京夢華錄所載，“凡雇覓人力，幹當人、酒食作匠之類，各有行老供僱，覓女使，即有引至牙人”。夢梁錄亦記“凡雇倩人力，俱各有行老引領”，勞動者似乎還沒有完全脫離封建行會的束縛。就是說，勞動者似乎還不是“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商品的所有者，至少是不完全的所有者。

馬可孛羅遊記所記載的，是公元一二七九年前後的情形。由於馬可孛羅是生長於比較中國落後的威尼斯⊖，對於當時中

⊖ 馬可孛羅的父親和叔父都是意大利威尼斯商人，他對於工商業特別注意。